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台国应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白 国 应 选 集

吉 林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四 川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合 编
成 都 东 方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所

一 九 八 八 年

白国应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主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历



白国应，男，1933年7月7日出生于广西宾阳县新桥乡白岩村。195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同年，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

现任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图书资料情报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修订小组负责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献工作标准化委员会第五分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国家机关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兰州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6年开始研究图书分类学，编著有：《图书分类学》、《图书分类学文集》、《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各种图书分类方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和编制方法》等书。发表过论文一百多篇。

1958年，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辑出版工作，并负责编辑该书第一版的索引。1970年负责该书第二版的修订工作。1974年，出版下册（包括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和附表），1979年，出版上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和社会科学），1982年出版第二版全书索引。该书荣获中国科学院1986年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科技情报成果奖二等奖。

1959年，参加了《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辑工作

组，并主编“语言文字学”类。1979年被聘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编的第二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及其简本，经评审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从1959年起，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业务研究和辅导工作，对全院文献情报工作的理论、方法、政策、策略、规划、计划和规章制度等进行研究，并参加组织全院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术活动和业务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二、三、四、五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论会的组织委员或秘书长。

从1958年起，还从事图书情报人才的培养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北京地区图书馆红专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历次图书情报人员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班的《图书分类学》课程的讲授工作。另外，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和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生班分别讲授《图书分类学》和《科技文献的管理》等专题课程。

为了系统总结科技文献管理和情报研究的经验，在北京市情报学会的领导下，与刘毅夫、傅秉一等同志共同负责《科技情报工作基本知识》的总编和终审工作。该书被评为优秀科普作品。这几年来，曾为中央一些部委情报所和省、市情报所举办的情报训练班讲授《科技文献管理》课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应图书情报界的盛情邀请，作了一系列的专题学术报告，题目有：科学发展与图书分类；图书馆工作情报化；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必须以文献工作为基础；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中国图书分类学的回顾和展望、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政策性问题；图书馆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图书馆工作如何开展新局面；图书馆发展战略

研究以及图书馆工作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等。

1979年，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业务人员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和研究辅导部同志们一起，负责组织院内部分同志共同编写《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共十三册。并主编《图书分类》一册。

1986年8月，曾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图联第52次会议。10月，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事业创建30周年纪念时，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全国科技情报系统先进工作者。

序

《中国图书馆学论丛》丛书之一，作者是白国应同志。

作者广西宾阳县人，生于1933年7月。年二十一，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夏毕业。经过二十余年的实际工作、教学工作、编辑工作，著述工作等，现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辅导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修订小组负责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兰州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委员会第五分会委员等职。真是壮年有为，不可多得。

1956年开始研究图书分类学。二十多年刻苦钻研探讨，陆续发表有关的编著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和编制方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印 1975年）、《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山西《图书馆通讯》编辑部印 1981年）、《各种图书分类方法》（同上）、《图书分类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1年）等书，以及论文60多篇。

1958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辑出版工作，并负责编辑该书的索引。1970年负责该书第二版的修订工作。1974年出版下册（包括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和附表），1979年出版上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和社会科学），1982年出版全书索引。

从1958年冬起，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北京地区图书馆红专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历次训练班的《图书分类学》课程的讲授工作。另外，还为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生班和中央一些部委情报

所情报训练班、进修班、研究班开设了《科技文献管理》课程。

1959年，参加了《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草案》的编辑工作组，并主编“语言文字学”类。1979年被聘为《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9年，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情报业务人员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在馆长领导下，负责组织院内一部分同志编写《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共13分册，并主编《图书分类》分册。又为了提高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队伍的业务和学术水平，在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和院图书馆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历次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讨论会和各种业务研究班，进修班、训练班，并参加编辑有关论文集。

1982年，为了普及科技情报科学基础知识，在北京市科技情报学会的领导下，与刘毅夫、傅秉一等同志共同负责《科技情报工作基本知识》的总编和终审工作。

根据作者以上的经历及其参加种种活动，可说头绪纷繁，工作紧张，然而在百忙之中，作者仍能写出一百多万字的著述，尤其是象《图书分类学》这样的拓荒论著，就可见其钻研探索的专心一致。毅力过人，实属难能可贵。

本集共收论文9篇，可分为两组。开头四篇是论及图书情报化、图书情报工作、科研人员阅读文献的规律以及图书馆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其余五篇都是讨论图书分类法中的各种问题的。

1978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实行图书情报一体化，建立全院的图书情报体系，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全院的图书情报中心，分院图书馆负责分院的图书情报工作，研究所设立图书情报研究会，统管全所的图书、资料、情报工作。这一决议是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系统改进的巨大创举。《试论图书馆情报化》这篇文章，就是大力阐述这次会议上的决定，说明图书馆三个时代中的主要特征、属性、

职能和机构的性质、类型，陈述图书馆情报化的三个重要作用，以及提出如何情报化的三种具体措施。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针对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实际上也提醒全国各类型图书馆同样地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加强这项工作。因此这篇文章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我们应该十分重视。

图书馆工作如何开创新局面？这是当前全国一片改革大好形势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要求有正确的答案，本选集第二篇文章是应认真阅读并加以深思考虑的。

为要使《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发展规划纲要1979——1985年(草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达到胜利完成，作者于是撰述《试论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作用、方针和任务》一文(集内未收)，内容分为：一、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二、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作用；三、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方针；四、科学院情报工作的任务。其中对“任务”方面尤为详，析为七点：

(1) 加强文献基础工作；(2) 开展参考咨询和文献检索工作；(3) 切实做好情报调研工作；(4) 积极开展图书情报理论的研究工作；(5) 逐步实现图书情报工作手段现代化；(6) 要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图书情报干部队伍；(7) 切实加强对图书情报工作的领导。本文明确了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作用，方针和任务，“不仅是为了弄懂一些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理论变成促进科学院图书情报事业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激发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革命热情和工作责任感，以便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这些并非徒托空言，而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只要深入观察近两三年来中国科学院利用图书情报工作的成果为党和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培育出来的大批人才，就可证明。

为要有助于情报图书部门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作者曾对科研人员阅读文献的活动，进行调研，找出了

其中的规律。《科学研究人员阅读科技文献规律初探》一文(集内未收),就是由此而来。文中举出六条规律:一为对文献需求有明确的目的性,二为对文献需求有全面性,三为对文献需求有系统性,四为对文献需求的时间性很强,五为对文献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六为阅读文献讲究技巧性。目前有人预测将来,图书馆会消失,图书馆员则将永存,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文献服务。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学习掌握这篇文章调研的结果,未雨绸缪,不是更能闯出新路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吗?

为要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图书分类法思想性问题上的流毒和影响,作者撰述《论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一文(集内未收)。这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12月,正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上册第二版修订出版之后的一个月,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修订之中,也是一篇由《科图法》修订时所得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性论文。“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我们图书馆界也曾出现了一些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在图书分类法思想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作者首先批评有些同志片面强调了思想性、夸大了思想的作用、把思想性和科学性对立起来,以及对难于掌握思想性原则而产生恐惧心理等等情况,认为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

“主要是指图书分类法的政治方向,指导思想和一些有关的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要紧密地与图书分类法的实际相联系,实事求是,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具体说到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应该包括:1、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2、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3、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我国图书分类法的遗产;5、洋为中用,认真学习运用外国图书分类法的经验”。

接着作者围绕着以上五点,一一阐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

年在图书分类法体现“三性”中所获得的成就，痛斥林彪、“四人帮”对图书分类法问题上流毒，评论几种图书分类法在体系上、立类列类上、类名的选择上、注释上形成种种不合理，并对这些不合理事实提出改弦更张的办法，因此，这篇文章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而言，是篇名正言顺、大义凛然的檄文；对图书分类法的编制修改是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它的本身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撰写的，我们应该吸收其中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对图书分类法的思想问题，再深入探讨，力求把林彪、“四人帮”过去在图书分类法上的流毒和影响，加以彻底的揭露和排除，真正做到作者所论的那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来为社会主义新时代而服务。

理论是实践的结晶，同时又是指导实践的南针。上文的写成，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是作者多年来对图书分类法的教学、研究，对图书分类工作的实践、指导的产物。如《也谈传记图书分类——与刘国钧先生商榷》一文，发表在1962年第3期《图书馆》上，当时就引起我的极大注意。通过这篇文章，作者对刘国钧先生《取消图书分类法中的传记类》一文中提出“在今后的图书分类法中不必设传记专类”，“传记书籍应当按其内容分别归入有关各类”的三条理由，逐条分析。文中对传记的“立类标准”、“著作形式”、“内容实质”、“主要作用”、分类趋势等等问题，作者都能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引例证、提办法，很有说服力。因此嗣后对传记立专类与否，曾引起全国图书馆界的重视，但发表的文章都同意作者的意见。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2年以后新编或修订的图书分类法如《中图法》、《科图法》、《人大法》等等，都未取消传记专类。“事实胜于雄辩”，不言而喻。

至于《关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修订中的几个

问题》、《谈谈科学著作分类与文学作品分类的区别》、《边缘学科图书资料如何分类》、《论“0”的用法》四篇论文，可以说是对于《论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一文所提出五点的实际应用。在这些文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

作者在传记图书分类上虽与刘国钧先生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获得了理论和实践双方的胜利，然而作者依然是虚怀若谷，对刘先生表示无限钦佩，这就在作者《刘国钧先生在图书分类学上的卓越贡献》一文中体现出来的。

本文开始简介了刘先生的生平事迹，而后分为六点论述：一、批判地继承我国图书分类学的优秀遗产；二、积极地吸取外国图书分类学的宝贵经验；三、认真地探索编制图书分类法的正确道路；四、深入地研究图书分类学的基本原理；五、系统地总结图书分类法的工作方法；六、热心地培养图书分类学人才。通过这篇论文，使人可知刘先生在图书分类学上的卓越贡献，不仅有破有立，而且有行有教；更重要的，作者由此总结出一条为学有成的原则，就是必须贯彻“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方针，达到“集思广益、融会贯通”的境界，才能做出辉煌的成绩，既有益于学，又有利于世。

作者钦佩刘先生的同时，也很钦佩杜定友先生。刘杜二先生都是我国图书馆学老一辈的专家，他们都是认真学习美国图书馆学的，而对于图书分类法都曾编制类表，为当时四大图书分类法的组成部分。采用他们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或《杜氏图书分类法》（1935年改名）的图书馆为数甚多。因此这两位先生在我国图书馆界，尤其在图书分类学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杜定友先生与图书分类学》一文中，作者分为三段论述。开始是杜定友先生的传略，其次是论述杜先生研究图书分类学的三个时期，最后是对杜先生的评议。

所谓“三个时期”是怎样划分的，其内容特点又如何？文中说，“第一个时期是从1918——1949年止，在这时期里，杜先生主要是探索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问题。作者详为介绍杜先生所采用“先破后立”的方法，杜先生对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肯定其中十个优点的同时，指出了其中十大缺点，对我国的《四库法》，也提出十大缺点。而后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图书分类当以“内容的异同为标准”，“不应以文字的不同而区别”，于是着手编制新型类表，命名《世界图书分类法》，就是企图解决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问题。

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1958年9月，杜先生因病退休。在这时期里，杜先生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的指导思想，基本体系和寻求全国统一图书分类统一的途径。作者阐述杜先生曾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最重要而且有所影响的，一为“依靠真理，确定路向。”对此，杜先生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依据，提出应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类的指示为图书分类体系的依据，获得了全国的支持，而《广东人民图书馆分类法》的问世，正是“现身说法”。二为“统一分类法是必要的”。对此，杜先生曾写了不少文章，进行宣传，而对《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编辑座谈会的出席，编辑工作的进行，全部工作的完成，自始至终，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第三个时期是从1958年底到1967年逝世。在这时期里，他主要是探索图书分类法的新路向，研究图书分类学的新理论。作者介绍了这期间发表的重要论文，指出了几点突出的思想，如“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藏书的根本大法，百年大计”、“新图书分类表的设计，首先要分开类质和类素”、“分类与主题目录合流，创设一种新型的分类主题目录”、“近代图书馆的趋势，分类从略，目录从详”等等，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图书馆界的赞同，但从今日的发展形势来看，他的建议的确是真知卓见，值得我们继续

深入研究的。

最后一段，作者给杜先生定论的评价说：“在图书分类学问题上所花的心血和时间是很多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相当丰富的遗产，其中很多对我们今天研究图书分类学来说，仍有现实的意义。还有他思想敏锐、不断探索图书分类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坚强毅力，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勤奋学习、善于吸引新思想、新知识的进取精神；推陈出新，认真批判继承国内外图书分类学遗产的科学态度，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这些评语并非溢美，而是实事求是，很是中肯。

以上所论，可说是我阅读这选集后的浅见、体会和感想。对于作者历来发表的论著，我总以先睹为快；对他那种谦虚谨慎，助人为乐的态度，使我异常钦佩。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只有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以学知人，由人论世的境界，方才能够旷观宇宙，明察秋毫。作者就有这种风度。这实在值得青年同志学习，也同样值得壮年、老年同志学习的。这些就是我为什么乐于为这本选集作序的最主要原因。

钱亚新序于南京成园

1984年9月20日

目 录

简 历.....	(1)
序 言.....	(1)
试论图书馆情报化.....	(1)
关于图书馆工作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9)
关于图书馆的发展战略问题.....	(25)
我们对图书馆进行了学术评议.....	(35)
试论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关系.....	(46)
论“0”的用法.....	(69)
刘向、刘歆与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	(90)
刘国钧先生在图书分类学上的卓越贡献.....	(99)
杜定友先生与图书分类学.....	(112)
编著系年目录.....	(122)

试论图书馆情报化

图书馆搞情报工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就图书馆情报化这个概念的形成来说，只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对于图书馆情报化的由来，图书馆怎样情报化以及图书馆情报化的历史作用等，都亟须探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图书馆情报化的由来

图书馆情报化是现代图书馆最本质的特征，是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现代图书馆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过去一切图书馆中的优秀传统，而且和过去的图书馆比较起来，在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它使图书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级的阶段。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图书馆同样也是发展变化的。图书馆情报化就是图书馆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从古代的图书馆，发展到现代的图书馆，可以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它们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经济、政治制度，和科学发展状况等所制约，因而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古代图书馆，即第一代图书馆（藏书楼），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如汉代的东观，隋代的观文殿，唐代的弘文馆、集贤院，宋代的崇文院，元代的宏文院，明代的文渊阁、天一阁、汲古阁，清代的四库七阁等，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图书馆。至于外国，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很早以前也出现了图书馆。其主要任务是保存手稿和图书，主要性质是保存性或收

藏性,它在保存文化典籍,繁荣古代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图书馆,即第二代图书馆。它形成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由于经济上的产业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日益扩大,文化上冲破了封建宗教的禁锢,图书馆从寺院,教堂、宫廷中解脱出来,办到社会上,这是一大进步。机器印刷的出现,图书期刊的大量出版,促使图书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如十七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建立了全民族图书馆,如德国1661年在柏林建立王国图书馆,英国1753年在伦敦建立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美国1800年在华盛顿建国会图书馆等。除了建立藏书丰富的民族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要求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群众性的图书馆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美国、瑞士都建立了较发达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使居民群众能够广泛地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在我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封建社会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和发展,封建文化日趋衰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藏书楼已不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逐渐趋于没落和解体,新的图书馆出现了,例如1910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图书馆,各省也相继设立省图书馆,并宣布向民众开放。

“五四”运动以后,图书馆又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据1930年统计,全国有各种图书馆2935所。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图书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已由藏书楼变为社会教育机构,其任务除保存图书期刊外,主要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其性质除保存性外,还具有社会性和教育性,而且教育性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图书馆,即第三代图书馆,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献资料“爆炸”性的增长,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不仅要求图书馆提供一般图书资料,而且进一步要求提供最新科学情报。所以许多国家的图书馆